学术专论

清末知识分子的“新中国”构想

王玉玲

[摘要]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清王朝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救亡”和建立“新中国”[①]成了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们思考的主题。自清朝末期康有为提出“新中国”一词后，经改良派、立宪派和革命派知识分子的传播和发展，“新中国”成为清末知识分子共同构筑的一个流行词和国家理想，成为近代思想史上重要的一笔。“新中国”之“新”是区别于“中国古代王朝”涵义的“旧中国”而言的，是指“中国”进化成“近代完整国家”以后形成的“新国家”。清末知识分子们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提出了各种形态的“新中国”构想，本文将试着展现清末知识分子对“新中国”构想的提出、发展和变化历程，揭示不同时期“新中国”具有的不同涵义，以及“新中国”与同时期相关表述的不同特性。

[关键词] “新中国”　清朝末期　知识分子　国家构想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13）－04－0066－12

一、“新中国”构想的萌芽和提出

“中国”一词古已有之，有学者指出，它最早出现在西周初年，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时期的何尊上“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是最早记载“中国”一词的史料。[②]周人始兴之地在陕西关中，从关中看全国，关中为“西土”，而把新占领的“中原”称为“中国”，这时的“中国”一词还是一个地理概念。分封制使周人走向全国各地，作为统治民族，从统治民族的视角看全国，周人称其统治的所有地区为“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列国争雄，华夷杂居，“中国”词义多元，但与“夷狄”相对应的文化含义特别突出。西汉时中央政权自称为“中国”，匈奴等周边民族也称汉政权所辖区域为“中国”，“中国”一词开始具有一定的土地、人民、文化及主权等含义。1689 年，康熙皇帝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使用的国名称“中国”，中方首席代表索额图的全衔是“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分界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其所立议定边界之碑文规定以额尔古纳河“南岸属中国”。[③]康有为曾指出“中国向用朝号，乃以易姓改物，对于前代耳，若其

[收稿日期] 2013－08－11

[作者简介] 王玉玲（1986—），女，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wangyuling2199@163.com

① “新中国”是个相对的概念，相对于知识分子当时所处的中国现状而言，是人们为了改善当时的国家状况，所探索和追求的国家“新”面貌。并不泛指我们通常所说的 1949 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② 何志虎《中国得名与中国观的历史嬗变》，三秦出版社，2002 年，第 21 页。

③ 何志虎《康有为的“大中国观”与革命派放弃“驱除鞑虏”口号》，《史学月刊》2000 年第 5 期。

对外交邻，自古皆称中国。”① 应该注意的是，“中国”一词虽在古代就已经成为朝代对外的统称，但它并不具有近代意义上完整国家的涵义。直到近代以来，“中国”才得以完成近代意义的转换，具有统一中华民族的涵义。这一转换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入而完成的，1901 年，梁启超作《中国史叙论》一文，使用了“中国民族”一词，有时用来指称汉族（古为华夏族），有时则是将其作为对有史以来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在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和发生影响之初，“中国”一方面可指代“中国各民族”，另一方面也可指代一个民族共同体。② 1900 年，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对“完全成立之国”进行了解释，指出“王朝”和“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号召建立一个“少年中国”，这里的“中国”是近代意义上之“中国”，而非封建专制王朝之“中国”，也是本文所讨论的“新中国”构想之一种。

虽然“中国”一词的涵义在近代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但其近代意义真正得到广泛认同是通过与“新”字的结合实现的。“新”是与“旧”相对而存在的，指的是与已有的、过去的、陈旧的事物的不同。《康南海自订年谱》③ 中记载了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的一段文字：“既审中国之亡，救之不得，坐视不忍，大发浮海居夷之叹，欲行教于美，又欲经营殖民地于巴西，以为新中国。”④ 这是笔者所见近代以来最早出现“新中国”一词的史料记载⑤，这里的“新中国”是康有为设想的在巴西建立和经营的殖民地。康氏因深感清王朝的灭亡难以挽救，又因第一次上书未果，于是萌发“欲经营殖民地于巴西”、在巴西建立“新中国”的想法。此处“新中国”是区别于对外号称“中国”的清王朝而言的。《年谱》写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又言：“中国人满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乱离迫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纬度与吾近，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仅八百万，吾若迁民往，可以为新中国，当乙未，吾欲办此未成。与次亮别曰：‘君维持旧国，吾开辟新国。’时经割台后，一切不变，压制更甚，心虑必亡，故欲开巴西以存吾种。”⑥ 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由于中国人满为患，又因割地赔款损失了许多土地和财富，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自乙未年（1895）以来，康有为即产生了“殖民存吾种”的想法，他仔细考察世界各地，认为巴西最适合中国人迁移。他把移民巴西当做一项救亡措施，通过向外移民来挽救亡国灭种的危机。《年谱》中还记载了他最初是想通过将中国人迁往巴西通商做工的方式移民，并详述了这一设想的经过：“乙未之归，遇葡人及曾游巴西者，知巴西曾来约通商招工，其使来至香港，而东事起，巴使在香港候吾事定，至数月，东事益剧，知不谐乃归，吾港澳商咸乐任此，何君穗田擘画甚详，任雇船招工之事。于是拟入京举此，适胶州案起，德人踞之，乃上书言事，工部长官淞桂读至‘恐偏安不可

---

① 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426 页。

② 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

③ 笔者这里需作一说明，《康南海自订年谱》，手稿本原名《我史》，经茅海建考证是康有为于 1898 年戊戌政变后逃亡到日本花十天左右写成的，是对其对从出生到戊戌变法失败的回忆。关于康有为想在巴西建立殖民地这一记录，茅海建经过仔细核查手稿本和抄本，发现这段话在表述上是修改过的，而改动的字眼都是“新中国”三字以外的词语。笔者虽未见《我史》的手稿本，但从《年谱》中记载的光绪十四年和十五年之事情的时间上发现，欲在巴西建立“新中国”一事应在光绪十五年（1889），而非《年谱》中记录的光绪十四年（1888）之事。这可能是因为康有为对这两年的记录有过大的改写的缘故，以至漏了“光绪十五年”之题注，《年谱》加上去时出现了错误。这不是笔者最先发现的，茅海建在其著作中早已指出了这点。参见《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导论第 2—5 页，以及此书第 197 页注释【2】。

④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1），文海出版社，1966 年，第 21 页。

⑤ 有学者认为“新中国”一词为梁启超 1902 年首创（见王占阳《新中国：百年来的理想与实践》，《炎黄春秋》2011 年第 8 期），这种观点以笔者所见史料证明是不准确的。

⑥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1），第 39 页。

得’语，大怒，不肯代递……与李合肥言巴西事，许办之，惟须巴西使来求乃可行。”① 关于巴西在中国招募华工以及康有为欲在巴西设立殖民地的设想，茅海建先生在《我史》鉴注中运用大量档案和相关人士的记载进行了证实。② 孔祥吉先生认为康有为之所以萌发移民巴西的想法，与他受西方殖民思想的影响有关。③ 笔者认为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应与西方殖民主义区别开来，这可以从以下几则史料中得到证明。康有为在1895年《上清帝第四书》中，于“立科以励智学”一项中，介绍了泰西诸国“其有寻得新地，为人迹所未辟，身任大工，为生民所利赖者，予以世爵”的举措，结果“国人踊跃，各竭心思，急求新法，以取富贵。各国从之，数十年间，科仑布寻得美洲万里之地，辟金山以致富，每年得银巨万”④。康有为以泰西国家为例，请求光绪帝为实现国家富强而鼓励新法良策、辟新地。从上书内容可以看出他希望中国效仿泰西诸国的急切心情，认为“寻得新地”是泰西诸国富强的原因之一。康文珮曾回忆1901年其父康有为乘船赴印度途中，曾感叹“中国泥古少变，不讲殖民之学，久设海禁，故坐以南洋之地让人也。”⑤ 这里也表明康有为对“殖民”的看法和态度，康氏从甲午之后到1901年，一直未放弃对外殖民的想法，故我们可以推断，他所言的“经营殖民地于巴西”、“开辟新国”、在巴西建立“新中国”的设想具有一定的殖民主义倾向，但不能简单地将之与西方的殖民思想等同论之。因为这种对外殖民是建立在与巴西使者协商的基础上，必须是巴西使者来华请求官方，即“惟须巴西使来求乃可行”⑥。

笔者以为康有为之所以会有移民巴西的想法，还与其《大同书》中“去国界合大地”有一定的关联。康氏《大同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用大量篇幅阐述了“有国之害”以及“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他认为“然国域既立，国义遂生，人人自私其国而攻夺人之国……然因相持之故累数千百年，其战争之祸以毒生民者，合大地数千年计之，遂不可数，不可议。”于是指出“今将欲救生民之惨祸，致太平之乐利，求大同之公益，其必先自破国界去国义始矣”。继而康氏设计了去国界之后对人民、土地管理的办法，他列出大同合国三世表，关于土地、人民问题，在第二阶段“迁徙住居各国可以自由”，第三阶段的大同世界“无国界，人民听其迁徙住居。”⑦

不难发现，康有为移民巴西的想法与其《大同书》中人民“迁徙各国可以自由”有相通之处，康氏的“新中国”可以理解为大同社会的第二阶段中的各个自治国家之一，按照康氏“大同”社会的设计，这一阶段“人民迁徙住居各国，可以自由”。康氏在《大同书》丁部“去种界同人类”中提出奖励迁地杂婚之法，认为“欲致诸种人于大同，首在迁地而居之，次在杂婚而化之”，鼓励黄、白种人迁居至加拿大、南美、巴西与棕、黑人杂婚，以改良人种⑧。康有为提出的“殖吾民于巴西”，立“新中国”于巴西“以存吾种”的构想恰恰体现了这一思想。康氏在后来写作的《巴西》一文中，盛赞巴西“气候和平，疠疫不行，各国移民，皆保壮健”⑨，对巴西的土地、河流、气候、物产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从气候和地理状况证明了巴西是适宜移居的好地方。

---

①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1)，第39页。
②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198—210页。还可参考茅海建《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的初步考证》，《史林》2007年第5期。
③ 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58页。
④ 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81页。
⑤《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22)，宏业书局，1987年，第20页。
⑥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1)，第39页。
⑦ 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119页，第128页，第152页。
⑧ 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47页，第45页。
⑨ 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十集)，第161页。

关于《大同书》的写作、出版过程，据康氏所言，为1884年①，许多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汤志钧先生指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在1885年写作的《人类公理》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书中记载了诸多1884年以后的事，故真正成书不可能在1884年，而是在1901—1902年，并举了多处例子证明《大同书》的内容有很多1901至1902年发生之事。② 萧公权先生基本认同汤志钧的看法，他认为康有为1884至1887年所著的《万身公法》、《人类公理》及《实理公法》可能都是《大同书》的草稿。这几种未刊稿中反映了康有为主张全世界共用立法、说共同语言、在统一政府治理之下的"世界化"思想。③

梁启超在1901年所写的《南海康先生传》中叙述康有为的"世界的理想"，提到"破国界"、"归于大同"等内容，梁启超指出"先生现未有成书，而吾自十年前受其口说。"④据梁启超所言，康有为的《大同书》中"破国界"的思想应始于1901年的十年前即1891年以前。1921年《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到《大同书》："有为著此书时，固一无依傍，一无剿袭，在三十年前……然秘不示人，亦从不以此教学者，谓今方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其弟子最初得读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⑤ 这说明，《大同书》初稿应写于1891年之前，只是一直未予公布。

汤志钧、萧公权等认为《大同书》成书时间是1901至1902年，笔者以为，《大同书》最终定稿的时间应符合两位先生的推测，但是关于"破国界"的思想却是在1884至1891年间已经萌发，只是没有完全成型。梁启超所言"先生现未有成书，而吾自十年前受其口说"，恰恰印证了笔者的观点。在此书最后面世之时，康有为进行一些补充修改，这是符合常理的，这也是为何《大同书》中记述了多件发生在1884—1902年间事情之原因。《康南海自订年谱》中曾提到光绪十一年"乃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⑥，康同璧提到《大同书》时也曾言"自甲申（先君时年二十七岁）属稿，初以几何原理者人身公法，旋改为万年公法，十余年来，至是数易其稿，而卒年成大同书十部。"⑦也即是说，自1884年最迟至1885年，康有为已经萌发大同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写作《人类公理》。而康氏在巴西辟地建立"新中国"的想法是在1889年、1895年和1897年，不能说不受其已有思想的影响，故笔者以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去国界"、"世界大同"的思想。

梁启超用"理想与现实之调和及其进步之次第"⑧ 来评价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指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之处，康有为所提出的在巴西建"新中国"的设想，也恰恰反应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更何况在当时那样的社会，连康氏本人都秘不敢示人，"谓今方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故康氏所言的"新中国"就像《大同书》描述的社会一样只能成为一种空想，从史实记载也可看出，巴西是招募华工，并非是帮助殖民，康有为也并无财力在巴西购买或租用土地，实行其移民计划，所以他所称的开辟新国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⑨。但他提出建立"新中国"的构想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成为此说法的开拓者。应该指出，康有为此时所言的"新中国"只是对习惯称呼"中国"的一种区分，还没有具体的"国

---

① 转引自康有为撰，汤志钧导读《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导读第10页。

② 康有为撰，汤志钧导读《大同书》，导读第7—11页。

③ 萧公权著，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0、326页。

④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全编》卷8，第445页。

⑤ 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2页。

⑥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1)，第15页。

⑦《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收自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22)，第31页。

⑧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全编》卷8，第447页。

⑨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210页。

家”概念，随着西方国家观念的传入，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构想也逐渐趋于清晰化和具体化。

二、“新中国”构想的发展和深化

康有为提出的“新中国”是要殖民于巴西，另立“新国”。继康有为之后，建立“新中国”的说法得到了知识分子们的延续和认同。唐才常与谭嗣同曾共同商量在浏阳兴算学的问题，提出以浏阳一邑为“新中国之萌芽”①，他们二人是希望在地方兴新学的方式来营造一个“新中国”。唐才常 1901 年领导自立军起义，曾宣称 “我等谓满洲政府不能治理中国，我等不肯再认为国家，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变旧苦境为乐境，不特为中国造福，且为地球造福，系我等义士所应为之责。”② 这里的“新中国”已经是一个稍显具体的构想，是要取满洲政府而代之的新国家。继上述三人之后，清末宣传建立“新中国”最有力者当属梁启超。梁启超的“新中国”设想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酝酿、发展过程，从 1900 年发表《少年中国说》，到 1902 年的《新中国未来记》，再到 1911 年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这几篇代表性文章，体现了梁启超对国家设计及建设问题的重视，也体现了梁启超之“新中国”构想的发展和变化。

《少年中国说》开篇便指出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 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 ……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 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 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 惟进取也，故日新。”③ 梁启超在这里明确反对日本人和欧西人称中国为“老大帝国”，并且提出“少年中国”的说法，他还分析了何为“旧”，何为“新”的涵义。于是将“希望”、“进取”和“新”与“少年中国”联系了起来。梁启超还阐述了“国”的意义，即“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 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④ 他指出，所谓完全成立之国，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于是欧洲列邦在此时为壮年国，而中国为少年国。

梁启超按照以上所言之国家概念，指出 “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其老年时代也，自余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⑤ 梁启超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只有朝廷没有国家，从国家的角度来衡量，中国目前只是一个逐渐发育、成长的“少年”，被称做“老大帝国”是不公允的。他接着分析: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⑥ 梁启超最后还以极大的气势鼓励有识之士为建立“少年中国”而努力，希望中国能早日成为完全成立之国。

---

① 唐才常撰，王佩良校点《唐才常集》，岳麓书社，2010 年，第 262 页。
② 叶德辉《觉迷要录》卷 4，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第 113 页。
③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清议报》第 35 期，第 2249 页。
④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清议报》第 35 期，第 2251 页。
⑤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清议报》第 35 期，第 2252—2253 页。
⑥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清议报》第 35 期，第 2255 页。

梁启超在1900年以“少年中国”来构建他心目中的未来中国，他指出中国自古无“国”之概念，他所言的“少年中国”是要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即完全成立之国，这就是梁启超当时向往之“新中国”。1901年，梁氏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指出康有为“欲任天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的抱负，正体现了《少年中国说》的期望，即“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梁氏对戊戌维新评价曰：“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① 这里的“新中国”是梁氏按照近代国家概念来定义之“新中国”，康梁领导之戊戌维新在近代中国最早提出要建立一个自古没有的、完整意义上的“新中国”，故为二十世纪新中国史第一章。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激烈抨击封建专制，他在《拟讨专制政体檄》中声讨专制政体之罪恶，号召青年起而推翻之，他指出“起起起！我同胞诸君！起起起！我新中国之青年！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我辈实不忍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②文中提到“新中国”之青年，说明梁启超此时已经产生推翻专制政体建立“新中国”的想法。梁启超此时期的思想极为复杂，“激进与保守常交战于胸中”，1901年发表的《立宪法议》中，大力赞扬“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③，并提出“首请皇上涣降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④。1902年在《新民说》第十三节“论合群”中表现出对共和政体的向往，他批评中国“公共观念之缺乏”，强烈反对“中国不可以言共和”⑤ 的说法，激励志士仁人为自由平等、自治共和而奋斗。那么梁启超的“新中国”究竟主张实行立宪还是共和呢？这可以从他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找到答案。

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新小说》杂志上发表《新中国未来记》，此小说是梁氏对中国未来六十年的一个设想，他设想的“新中国”成立于1912年，恰恰言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时间，小说中的人物、事件与后来“事实竟多相应”，岂不异哉！梁启超在小说中安排“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即1962）”为我中国“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⑥。梁启超将这六十年分为六个时代：“第一预备时代，从联军破北京时起，至广东自治时止。第二分治时代，从南方各省自治时起，至全国国会开设时止。第三统一时代，从第一次大统领罗在田君就任时起，至第二次大统领黄克强君满任时止……”⑦ 在小说中，梁启超为“新中国”设计了一个民主国方案。“其理想的国号，曰‘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罗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言其逊位也；黄克强者，取黄帝子孙能自强立之意。”⑧ 由此我们得知，“新中国”的第一任总统罗在田为清德宗光绪皇帝。他接下来介绍了“新中国”成立的基础“立宪期同盟党”，简称“宪政党”，当时志士希望中国行“立宪政体，期于必成，因相与同盟，创立此党，合众力以达其目的，所以用这个名。”⑨ 从以上内容可以推断：梁启超所预设的“新中国”是一个立宪国，实施的步骤是先从地方自治，进而开国会、立宪法，而后第一任“新中国”统领光绪帝顺应时势，让权与民，黄克强任第二届统领。梁启超的“新中国”前期应为君主立宪国，到光绪帝让权时转为民主共和国。故梁启超期望的“新中国”是一个渐进式平

---

①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全编》卷八，第420页。
②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0页。
③ 梁启超著，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5页。
④ 梁启超著，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407页。
⑤ 梁启超著，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三卷，第694页。
⑥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⑦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12页。
⑧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庸言》，第1年第1号，第3页。
⑨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14页。

和过渡的新国家，“非到万不得已之时，必不轻用急激剧烈手段”①，“新中国”的总统是主张渐进改良的黄克强，而不是主张暴力革命的李去病，也体现了梁启超对改良和革命的态度。《新中国未来记》反映了梁启超在革命与改良、共和与立宪之间的矛盾抉择过程，它体现的是一个由君主立宪过渡到民主共和的“新中国”。小说通过黄克强和李去病的精彩辩论，最终理清了“新中国”的实现途径，即联合志士、开展教育、充民力、开民智、兴民德；待民智大开，各省自治、开国会、立宪法，由仁慈英明的光绪帝任君主，先行君主立宪；进而圣主让权，人民共享民主共和、自由平等。

将梁启超构想的“新中国”与康有为比较，我们发现，晚清知识分子的“新中国”构想已经从纯粹空想发展为关注实现问题的理想。维新派总结戊戌变法的失败，认识到在旧的清王朝基础上图维新不足以救中国，旧政府基础上的小修小补根本无法挽救腐烂不堪的局面，故欲救中国必当立新国。麦孟华就曾发文指出：“旧物必不足以图存，苟安必不足以立国……故今日欲存中国则惟有组立新中国而已，新国不立，则不和固亡，和成亦亡，瓜分固亡，保全亦亡。”② 麦孟华此文发表在 1900 年，这里的“新中国”还仅仅是为了救亡而弃旧立新，而到 1902 年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对“新中国”如何建立问题的讨论，已经开始转为对实现途径的思考。

三、不同群体的“新中国”构想

在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人的影响下，“新中国”这个词在清末已开始被知识分子们接受和使用。而宣称建立“新中国”的除了维新派和立宪派，还有革命派。革命派与立宪派共同之处都是要推翻专制政体，不同的是，立宪派呼吁建立的“新中国”是立宪国，而革命派是呼吁建立“民国”即“共和国”。1894 年 11 月 24 日，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成立，其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是革命派最初的革命口号和目标。1905 年，革命派的政党组织同盟会成立，确定其政治纲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由兴中会到同盟会，革命口号“驱除鞑虏”和“恢复中华”始终未变，可见，革命派的“新中国”构想具有极其强烈的排满倾向。

1903 年，邹容在《革命军》中指出：“吾同胞今日之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者，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者也。”③ 他阐述了满汉不平等之种种劣迹，自从满族人进入中原，建立清王朝，汉族人就不得不被迫为满洲统治者做牛做马、为奴为隶。他认为欲扫除此专制政体、摆脱此奴隶地位，不可不革命，于是高呼：“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驱除凌辱我之贼满人、压制我之贼满人、屠杀我之贼满人、奸淫我之贼满人，以恢复我声明文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④《革命军》以激烈的词语和激昂的感情呼吁中国人起而革命，号召“黄汉人种”推倒满洲人所立之北京“野蛮”政府、驱逐住居国中之满洲人，认为：“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我同胞皆须自认为自己的汉种中国人之中国。”⑤ 但推翻满洲专制政府后要新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邹容提出：“定名中华共和国（清为一朝名号，支那为外人呼我之词）。中华共和国，

---

①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 16 页。
② 麦孟华：《论救亡当立新国》，《清议报全编》卷 3，第 369 页。
③ 邹容著，张梅编注：《邹容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7 页。
④ 邹容著，张梅编注：《邹容集》，第 30 页。
⑤ 邹容著，张梅编注：《邹容集》，第 49 页。

为自由独立之国……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立定。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国自治法律。”① 按照邹容的设计，革命派要建立的新中国是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国。

1903 年 6 月连载于《苏报》的一篇文章《驳革命驳议》，对立宪和革命进行了比较，指出："吾知一旦宪政党出现于中国，而政府之追讨，外人之干涉，犹如故也。夫低首下心，以求所谓维新者而终不成，何如倡言革命，反有万一之希冀哉！……革命之举，虽事体重大，然诚得数千百铮铮之民党，遍置中外，而有一聪明睿知之大人，率而用之，攘臂一呼，四海响应，推倒政府，驱除异族。及大功告成，天下已定，而后实行其共和主义之政策，恢复我完全无缺之金瓯……若夫维新……吾恐迟之十年、数十年后，仍不能睹效于万一，而中国之亡，已亟不能待，况满清政府之初无立宪思想乎？”② 作者章太炎、柳亚子、邹容等人指出了维新立宪的致命伤，即依赖没有立宪思想的清政府，结果必将失败，于是革命派高呼"无量头颅无量血，即造成我新中国前途之资料。”③ 革命派宣传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他们是要采取激进的方式，推倒清政府，制造出一个"新中国"。

1904 年柳亚子发表《哀女界》，倡导女界革命，宣扬"推到旧政府，建设新中国"，"公等亦得享自由、独立之幸福"④。《清史纪事本末》记载 1905 年革命义士徐锡麟从日本回国之原因："洞悉民族之义理、亡国之旧闻，慷慨激发，毅然以光复为职志，知新中国非大破坏不为功，欲以政界为着手地，遂返国。”⑤ 这里的新中国就是革命党人宣传的通过革命暴力方式建立之"新中国"。

1905 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指出："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⑥ 发刊词中点明了《民报》的宗旨，就是要推行三民主义，驱除满洲贵族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民主政治。作为革命派主将，汪精卫也宣称"以排满为达民族主义之目的，以立国为达国民主义之目的。”⑦以上这些都体现了革命派"新中国"构想中的排满思想。

与革命派排满建国思想不同，1907 年初，杨度在《中国新报》上刊登的《金铁主义说》中，提倡"五族合一、君主立宪"。他认为"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至于合五为一，则此后中国，亦为至要之政。”⑧ 在杨度等人的影响下，恒钧、乌泽声等一批满族留日学生创办《大同报》和《大同日报》，积极宣传满汉平等、五族大同的思想，提出："一、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二、主张开国会以建设责任政府；三、主张满汉人民平等；四、主张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⑨ 立宪派主力蒋智由也曾指出："于立宪之下，合汉满蒙诸民族皆有政治之权，建设东方一大民族之国家，以谋竞存于全地球列强之间者是也。”⑩ "合汉满蒙诸族、共建统一国家"是二十世纪初建立"新中国"的主流思想，辛亥革命后，革命派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提出了"汉、蒙、满、回、藏"五族共和的主张，以五

---

① 邹容著，张梅编注《邹容集》，第 50 页。
② 章太炎撰，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 年，第 229—230 页。
③ 章太炎撰，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集》上册，第 231 页。
④ 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 年，第 936 页。
⑤ 黄鸿寿编《清史纪事本末》卷 72，民国三年石印本，第 366 页。
⑥ 孙文《民报发刊词》，《民报》1905 年第一期，第 2—3 页。
⑦ 汪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1905 年第一期，第 29 页。
⑧ 杨度《金铁主义说》（续第一号），《中国新报》第一卷第二期，第 92 页。
⑨ 乌泽声《大同报序》，《大同报》第一号，第 20 页。
⑩ 蒋智由《变法后中国立国之大政策论》，《政论》1907 年第一号，第 34 页。

色旗作为新建中国——中华民国的国旗，改变了最初的排满倾向，体现了革命党人“新中国”构想的进步性。

在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共同影响下，1910 年，上海名医陆士谔还曾写成小说《新中国》，畅想了一个 40 年后的现代化“新中国”，其中对于上海未来的预言尤为准确，被称为晚清传世的一本“奇书”。陆士谔的小说《新中国》，又名《立宪四十年后之中国》，全书以梦为载体，描述了自己梦中所见的上海，透过上海来预测 1951 年的“新中国”。《新中国》实现了宪政，收回了租界，取消了治外法权，马路异常宽广，高楼鳞次栉比。在黄浦江上建成了浦江大铁桥，水下还有越江隧道，还造了地铁，中国自己的科学家们研制出了先进的机器和交通工具，人民生活幸福，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尊重。《新中国》虽是小说，但它反映的却是作者的一种梦想和期望。

陆士谔在《新中国》第一回中指出了小说写作时是宣统二年正月初一，梦中好友李友琴告诉他“今年是宣统四十三年”即西历一千九百五十一年，也就是说陆士谔的“新中国”是四十年之后（即 1951 年）的中国。小说描绘了“光绪三十四年各省人民请求立宪，公举代表入京”和“宣统元年，准行召集国会”的情景。① 小说第二回明确“新中国”是“立宪国”，众人平等。“各国一因公理，二因惮吾兵力，把领事裁判权废掉，租界交还。”② 第三回写道，中国曾在宣统二十年（即 1928 年）举办了“万国博览会”③。《新中国》还记述了一位叫苏汉民的医学家发明了“医心药”和“催醒术”两种学问。这两种发明是为了医治欧美、日本人所言的“病夫国”，自从“医心药”发行以后，国势民风，顷刻都转变过来，“催醒术”专治沉睡不醒病，只要用“催醒术”一催，就会醒悟过来。④ 小说还指出立宪前“所以萎靡不振者，都缘政体不良之故。”⑤ 这些都体现了作者对于立宪的期望和对美好生活的畅想，希望通过立宪来建立一个“新中国”，改善中国的社会风气和国家状况。小说还提到了“我国人创业，纯是利群主义，福则同福，祸则同祸，差不多已行着社会主义了”⑥，社会主义思想被陆士谔所闻知主要得益于他的妹妹陆灵素。陆灵素是南社杰出女诗人，是同盟会会员刘季平的妻子。1907 年，她参与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提倡女界革命，并出版刊物《天义报》，1908 年《天义报》发表了民鸣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成为《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之一。陆士谔在《新中国》中指出“差不多已行着社会主义”，很大程度是受到其妹陆灵素及《天义报》的影响。第十回叙述了苏汉民新发明的一种专治邪念的药，帮助除掉人们的恶根性，结合前述“医心药”和“催醒术”两种发明，共同体现了作者唤醒国民、除恶改良的理想。第十一回是海军操演的场景，展示了许多“无国可比”的武器和兵舰，这也承载着作者对我国军事实力增强的期望。《新中国》虽然只是描述作者的一个梦，但是却表现了对新事物、新风气、新文化的追求和渴望，同时也表达了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心和热爱，对“睡狮破浓梦、病国起沉疴”的希望和期待。

陆士谔的“新中国”可以说与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中的“新中国”一脉相承，但陆士谔的《新中国》已经是对未来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面貌的具体畅想，这无疑体现了知识分子对“新中国”构想的发展，也体现了这个“新中国”已经成形，具有了内部器官和构造，不再是萌芽阶段的模糊胚胎。

1911 年，梁启超在《国风报》上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对“新中国”的建设发表看法，文章从国体和政体两方面着眼。上篇讨论中国应实行“单一国体”还是“联邦国体”，主要针对

---

① 陆士谔《新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9—10 页。

② 陆士谔《新中国》，第 18 页。

③ 陆士谔《新中国》，第 38 页。此处，学界有不同意见。有一说为“内国博览会”，指国家内部的展览会;有一说为“万国博览会”，并以此认为陆士谔预测到了 2010 年的上海世博会。

④ 陆士谔《新中国》，第 49—50 页。

⑤ 陆士谔《新中国》，第 65 页。

⑥ 陆士谔《新中国》，第 55 页。

当时各省相继宣告独立之后该不该联合、怎样联合的问题。梁启超介绍了两种不同观点，即联邦论者和非联邦论者，最后发表自己的见解，提醒国人："欧美人所谓完全自治机关，求诸我国，实渺不可得。夫德之各邦、美之各州，其内部之构造，实与一国无异者也。今日合全国俊髦，以谋构造唯一之新中国，犹惧不给，其更有余力以先构造此二十余邦乎？此不可不熟审也。"① 文章下篇讨论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的问题。梁启超将共和政体分为六种，着重以美国、法国和英国为例，分析了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的优劣。他指出："虚戴君主之共和政体何如？此虽未敢称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者矣。"② 最后说："盖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不适于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③ 应该注意的是，梁启超虽认为虚君共和比民主共和更加适合当时要建设之"新中国"，但他也看到中国无一人可以担任英国式的"虚君"，认为"现皇室既不能戴，则我国行虚君共和制之望殆绝也。夫民主共和制之种种不可行也既如彼，虚君共和制之种种不能行也又如此，于是乎吾新中国建设之良法殆穷。"④ 梁启超分析了种种国体和政体的利弊，他希望中国国民能够慎思审择，他在《新中国建设问题》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人民选举终身大统领之共和政体何如？此共和政体之最可厌恶者也。何以故？以他种皆为共和立宪政体，独此种为共和专制政体故……又此种政体最后之结果，必变为君主专制政体。果复为因，因复生果，必酿第二次革命。"⑤ 1912 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建立了中华民国，仿效的是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度，遗憾的是，袁世凯担任大总统以后，民主共和名存实亡，特别是迫使国会选举其为终身大总统，又闹出洪宪帝制的丑剧，引起"二次革命"的爆发。这些都说明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中的思考，对"新中国"的现实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远瞻性。

四、"新中国"话语选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清朝末期，知识分子们之所以选择"新中国"作为他们的国家构想，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新中国"与同时期出现的相关表述和概念相比，如与"新中华"、"大清"等提法相比，更加符合国家构想的范畴，具有更强的合理性。

早在 1898 年，康有为在《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⑥ 中就曾进言："为中国计，而求其治本，惟有君民合治、满汉不分而已。"请求皇上"立裁满、汉之名，行同名之实"，并指出"伏惟今定国号，因于外称，顺乎文史，莫若用中华二字。"⑦ 章太炎在 1908 年发表的《政闻社解散之实情》一文中也曾指出："康有为已遍发檄文，传入腹地，以改号撤帘迁都为号。夫请开国会者，亦欲清政府之听从耳。今先讼言改大清国为中华国……"⑧ "中华"二字曾一度被康有为当作中国的理想国号，而革命派建立"中华民国"也以"中华"作为国名的一部分来使用，这足以说明"中华"在清末知识分子国家构想中占据重要地位，那么为什么知识分子们最终更多地选择"新中国"而不是"中华"或"新中华"作为他们的国家理想呢？笔者经过考查发现，

---

① 梁启超著，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八卷，第 2434 页。
② 梁启超著，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八卷，第 2441 页。
③ 梁启超著，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八卷，第 2442 页。
④ 梁启超著，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八卷，第 2443 页。
⑤ 梁启超著，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八卷，第 2438 页。
⑥ 黄兴涛在《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载《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 年 2 月创刊号）一文的注释 50 里，指出康有为此文是 1910 年伪造，笔者参考的《康有为全集》时间仍为 1898 年。
⑦ 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 426 页。
⑧ 章太炎撰，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集》上册，第 478 页。

“中华”最初与“中国”一词是通用的，1902 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指出：“立于五大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若夫二千五百年以上之书，则我中国今传者尚十余种，欧洲乃无一也。”① 这里的“中华”和“中国”涵义是相同的，指历史上各专制王朝建立的国家。但后来“中华”一词的涵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多指代的是民族概念，而非国家概念，它大多以“中华民族”的概念被使用。梁启超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华建国，实始夏后。古代称黄族为华夏，为诸夏。”② 这里的中华，已经开始指代华夏民族，即汉民族。③ 1905 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④ 1907 年，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明确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称呼的历史。他指出：“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⑤ 杨度指出，中国为地域概念，而中华为文化民族概念，于是“中华”也就成了中国民族的指称，它最初专指汉族，后来指中国境内的多民族大融合。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还指出：“大明之非国名，大清之非国名，明国非中国，清国亦非中国。”⑥ 笔者认为，正如杨度所言，大明、大清都不能称其为国家，只是一个专制统治政府的朝号罢了。“中国”和“中华”作为国家民族话语的历史发展，将二者的具体指代涵义清晰地区分开来，“中华”成为民族指称的专用术语; 同时伴随着知识分子们对朝代和国家概念理解的加深，“大清”成为知识分子们要打倒和推翻的对象，另一方面因革命派的仇视，“大清国”也只能成为历史的遗弃者。这也就说明了清末知识分子们在构想未来国家时选择“新中国”，而不是选择“中华”、“新中华”或者“大清”的原因之所在。

纵上可以看到，在先觉者的宣传和启发下，“新中国”一词成为清末知识分子在国家构想方面的流行话语，建立“新中国”也逐渐取代“中华”“新中华”等相关表述，成为清末知识分子们共同追求的国家理想。从康有为甲午以后提出立“新中国”，进而谭嗣同和唐才常讨论推广算学于湖南浏阳，以为“新中国”之萌芽，而后梁启超写作《少年中国》和《新中国未来记》，设想建立一个立宪民主的“新中国”，革命党人章太炎、邹容等人指出以无量头颅造成民主共和之“新中国”，柳亚子号召“推倒旧政府，建设新中国”，徐锡麟宣传非破坏无以立“新中国”，孙中山、汪精卫等人宣扬建立民国，晚清名医陆士谔写作小说《新中国》，对“新中国”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划和构想。由此，“新中国”已经从它的提出到讨论为什么建立，进而深入到如何建立和建立什么式样的层面。“新中国”自提出以来，也从一个没有具体国家涵义的阶段，发展到了具有近代国家内涵的“少年中国”，进而是实行宪政的“大中华民主国”，然后是民主共和的“中华共和国”，最后是现实中的中华民国。清末十几年的时间里，知识分子们对“新中国”的构想逐步深入和具体，使它从一个模糊的概念，逐步发展为一种具有深层内涵的理念和追求。新旧交替是事物进化的自然规律，清末知识分子的“新中国”构想只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们构建“新中国”的起点和初始阶段。民国以后，新型的知识群体必将在此基础上，继续着他们的“新中国”探索。

---

① 梁启超著，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三卷，第 561 页。

② 梁启超著，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三卷，第 563 页。

③ 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

④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新民丛报》第三年第七十号，第 44 页。

⑤ 杨度《金铁主义说》(续第四号)，《中国新报》第一卷第五期，第 17 页。

⑥ 杨度《金铁主义说》(续第一号)，《中国新报》第一卷第二期，第 29 页。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锋教授和夏明方教授的指点和帮助，在此对两位老师表示感谢。）

主要参考文献

[1] 黄鸿寿编 《清史纪事本末》卷 72，民国三年石印本。
[2] 何志虎 《康有为的“大中国观”与革命派放弃“驱除鞑虏”口号》，《史学月刊》2000 年第 5 期。
[3] 何志虎 《中国得名与中国观的历史嬗变》，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 年。
[4] 黄兴涛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
[5] 蒋贵麟主编 《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22），台北：宏业书局，1987 年。
[6] 茅海建 《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
[7] 孔祥吉 《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年。
[8] 康有为撰，汤志钧导读 《大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9] 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 《康有为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0] 李华兴，吴嘉勋编 《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
[11] 梁启超著，张品兴主编 《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
[12] 梁启超 《新中国未来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13] 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 《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14] 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
[15] 唐才常撰，王佩良校点 《唐才常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 年。
[16] 萧公权著，汪荣祖译 《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
[17] 叶德辉 《觉迷要录》，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
[18] 张枬、王忍之编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60 年。
[19] 章太炎撰，汤志钧编 《章太炎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
[20] 陆士谔 《新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21] 邹容著，张梅编注 《邹容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

“New China”: The National Ideals of Late Qing Dynasty Intellectuals

Wang Yul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wangyuling@163.com)

Since the Opium War, China has experienced great change that that was unprecedented during the previous three thousand years. When the Qing Dynasty was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establishing a “New China” became a major topic of intellectual discourse. Kang Youwei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propose the concept of “New China.” As result of intellectuals disseminating and using the concept, “New China” became a popular term and national idea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will try to show how the concept of “New China” developed and changed, to reveal the various meanings of “New China” in the different periods, as well as it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s compared with related expressions in the same period.